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Pedagogy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 著 郭洋生 译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 著 郭洋生 译 张 华 审校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PEDAGOGY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 / (加) 史密斯 (Smith, D. G.) 著; 郭洋生译; 张华审校.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9 (2001. 6 重印)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 张华主编)

书名原文: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Pedagogy

ISBN 7-5041-2021-9

I. 全 ... II. ①史 ... ②郭 ... III. ①教育-研究-现代-文集 ②教学法-研究-文集 IV. G4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81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0-3098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2003339 传 真 6201380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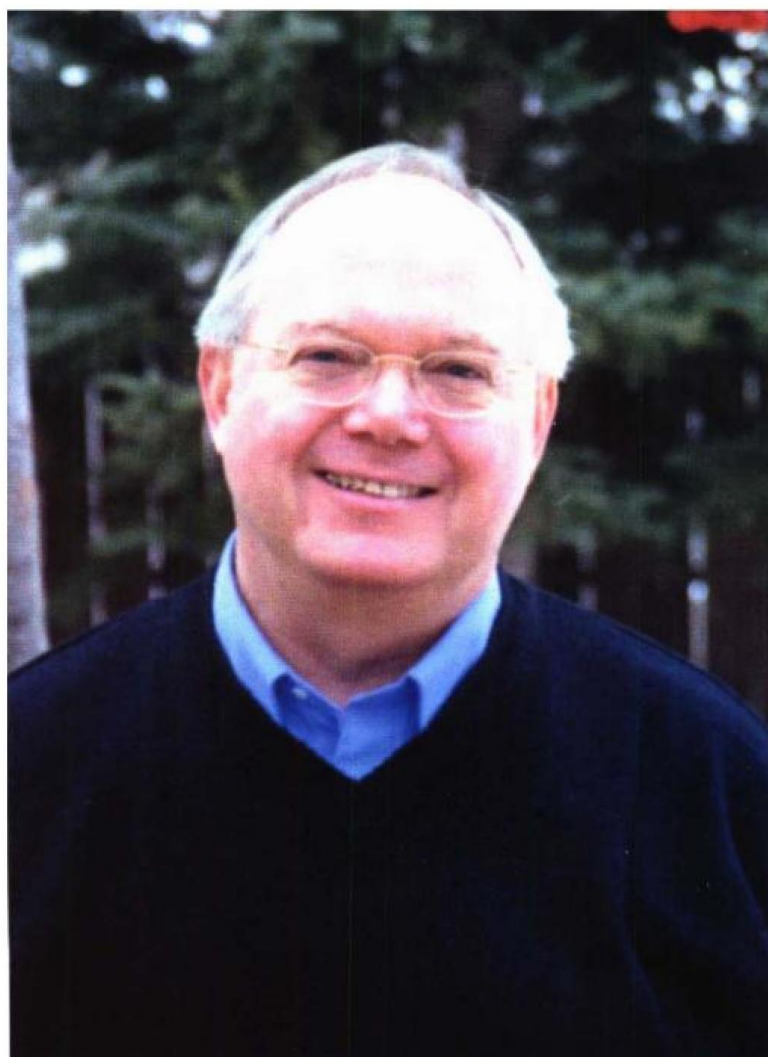
字 数 205 千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
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项目



David G. Smith

作者简介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 (David Geoffrey Smith) 1946年出生于中国重庆，父母系来华传教士。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女王大学、维多利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获英国文学、社会科学、神学、课程研究等方向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并在维多利亚市中小学执教5年。1983年起，在圣·托马斯大学、莱斯布里奇大学任教，并创建了教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任阿尔伯塔大学“特聘（高级）教授”，讲授课程理论、全球化、跨文明对话等

课程，目前正筹建国际教育与社会研究中心。

史密斯教授被誉为“北美课程研究领域的领先学者之一”。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往往站在学科前沿从事课程理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独辟蹊径，运用现象学和阐释学理论探讨教育问题；80年代又率先提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教育观念；90年代其研究视野扩展到教育学与全球文化上来，探讨全球化与当代教育的关系。本书对于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钟启泉 张 华

编委会成员 钟启泉 高 文 张 华 李雁冰
崔允漷 孔企平 王红宇 郭洋生
李树英 欧用生(台湾)
罗厚辉(香港)

【美】派纳(William F. Pinar)

【美】多尔(William E. Doll, Jr.)

【英】劳顿(Denis Lawton)

【加】范梅南(Max van Manen)

【加】史密斯(David G. Smith)

【日】奥田真丈

【日】市川博

在东西方对话中寻求教育意义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主编寄语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这种“范式转换”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教学研究领域则走出仅作为教育心理学之应用学科的狭隘视域，开始运用多学科的话语来解读教学的无尽意义。于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返魅”了：五彩缤纷的话语体系竞相追逐、璀璨夺目、魅力四射！

“返魅”后的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

那就是自觉地在东方文化中寻找课程与教学智慧，试图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会通与整合。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学的、后现代的、全球化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皆有这种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课程与教学理论应怎样确立自己的生长点？答案是确定无疑的：立足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中国古代课程与教学话语，又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课程与教学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这种“扬弃”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选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名著加以选译，以为东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我们期盼着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不断走向繁荣与辉煌！

钟启泉 张 华

1999 年 12 月 22 日

前言

首先,深深地感谢钟启泉教授、张华博士和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有关人士,承蒙他们的厚爱,拙作有幸结成集子,作为“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之一出版。参加这个项目,我深感荣幸,并期盼着日后相互间有更多的来往、对话和交流。我们面临的世界,越发需要各大文明国家、民族之间更深入的理解,而中国无疑是人类文明中最历久不衰的范例。

对中国和她的人民,我一直怀着特殊的亲情。这并非偶然,而确乎是缘分。笔者于1946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之后在扬子江畔的涪陵度过了生命的头两年。到1948年,政治形势的发展意味着“老外”越发不受中国的欢迎,于是,我们一家只好返回加拿大。然而,出于只有上天才可能知晓的原因,我始终觉得自己多少是个中国人。因此,虽然到1976年我才首次有机会看看生我养我的那片国土,1996年终于探访

了我的出生地，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总是那样令我魂牵梦萦。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人来到这个世界头两年的生活，对其感情产生着最深刻的、永远磨灭不掉的影响。就我的切身经历看，此话不假。虽然我的种族和语言使我无法享有特权自称是中国人，但是，中国早已将她的记忆融进了我的体内。本书便是一位有幸与你们分享了同一块沃土出生的加拿大人，向中国的兄弟姐妹们敬献的一份友谊信物。

在当今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包括了五花八门的东西，其中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就其消极面看，昔日那一系列帝国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以新的面目和姿态延续到当代，并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效法和支持。那套方式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地方身份的毁灭、贫富差距的拉大。于是，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可能会埋下新式的人类灾难的种子。这种形式的全球化，迫切需要得到全球性的大辩论。

全球化的积极面，则是通过其消极面的后门发挥作用的。因为有了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世界各地的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面对着。如今，各国人民有机会跨越国境、跨越不同的政治局限，分享知识、技能和经验。至少到目前为止，互联网通过新式的人类网络交流，造就了一定的信息民主化。虽然有一天，这份自由可能会消亡——因为通讯技术日后难保不会成为私人或国家资本的又一商品，但就眼前看，互联网可以充当潜在的、新型的人类交往的象征，有望让那些古老的、使

得世界各族人民长期相互隔绝、相互猜忌的恐惧和偏见逐渐腐蚀掉。至少，让我们怀着这份希望。

正如过去一样，东西方之间有许多可供相互学习的东西。虽然今日的东方在向西方学习现代技术以求发展，可昔日正是中国的技术，如火药、航海设备、印刷术等，给西方提供了自我发展的手段。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正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启迪了欧洲的哲学家，激发他们朝这个方向思考：社会秩序的建立，也许不能靠陈旧的、失败的基督教神学逻辑，而应依赖人的理性和基本智慧。

当今西方的教育，正面临普遍性的危机：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教育费用由谁来承担，教育应该为谁的利益服务，如此等等，问题重重。有些理论家称今日的西方教育为“文化战争”。我个人认为，西方教育已过分技术化，受资本商品化压力以及自 17 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心脏位置的那个过分发达的个人主义的驱使。因此，西方各式各样的教育体系所产生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独特的人格：自私自利，争强好胜，只顾满足自身的欲望和需要，而不具备任何道德理念。我这样说，不免会有以偏概全、过于简单化之嫌。不过，北美中小学发生的日益严重的暴力事件，不得不让人相信：要么是学校因为**教学法**的某种缺失而未能履行好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要么是较大范围的个人主义文化里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已如此泛滥，学校已无回天之力了。也许，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

身处西方，我们常听说中国想从西方那里学习或引进技术，包括教育的各种技术，而不想沾染上困扰西方的那些社会

和文化的痼疾新患。就目前看，情况还算好。然而，有一点颇值得注意，这世界上并没有诸如纯技术——随手拿得起来、随处放得下、供人随心所欲地利用的技术——之类的东西存在。这是因为，特定的技术形式总是产生于人的特定的思维方式，而那些特定的思维方式又源于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对特定事物的关怀。当代西方技术**就代表**西方，而不仅仅是其副产品，因此，引进技术事实上就是引进文化。同样，学会掌握所引进技术的过程，事实上也可能是逐渐受该技术掌握的过程。假如西方所有的技术本质上是为意志 (the Will) 服务的工具的话，那么，中国对那些技术的引进可能会无意识地在其人民中间培养出新型意志。这一点颇为微妙，但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确是事实。这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只不过我们不能天真烂漫地看待正发生的一切。由此，我想到了中西方就教育进行新型的对话问题。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时间是与外界隔绝的，我们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幸好，我们能够接触到已经在西方出版的伟大的中国文化的哲学经典。于是，很多人拜读这些作品，从中获得道德和智慧的指导——尤其是在西方始于 60 年代的社会动荡期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的“智慧传统”的浓厚兴趣，一直持续到今天。西方各地的书店，摆满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关于这些著作的点评。西方所以有如此兴趣，我认为在于这些著作作为西方自封身份一部分的那些痼疾提供了一副解药。假如西方的身份是建立在诸如个性独立、个人自由、为意志服务的技术胜利之类的臆断之上的话，中国的智慧所提

供的则是宇宙本原的和谐、教育自我和他人懂得该和谐是怎样运作的重要性这样一些宇宙哲学观。中国的儒家和较早的道家和佛家，便是以此为“育人”之本的。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的学说所以令西方人心驰神往，是因为它们源自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在西方，该关系几乎被科学毁灭殆尽。随着西方科学在功能上日益技术化、商业化，它已丧失了眼光，看不到自然界具有的教育学意义。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儿、昆虫，动物、植物，能够教给我们怎样生活的一些重要真理。可是，当这些鸟儿、昆虫、动物、植物被活生生地带离其自然环境，由科学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它们便失去了教育力量，而人则失去了一些最伟大的教师。对此，我们万不可浪漫，因为毁坏自然的现象随处可见。更进一步讲，即便是自然灾害和瘟疫，从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也具有教育学意义，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学会怎样适应这类自然环境和条件，而不是一味地与之斗争。这可以说是西方心灵反思的一大要点。

在这些深刻的奥秘——西方技术成就的奥秘和中国古代智慧顽强的生命力的奥秘——方面，双方有很多可资对方学习之处，这点很重要。而更重要的也许是，要想认清业已存在的，但笼罩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指导着东西方的知识、政治、文化理性主义的层层迷雾之下的那个世界和谐，一方离不开另一方。拙著所收论文，大多是本着这个精神撰写的。读者会发现拙作中很多地方援引了亚洲哲学，因为在笔者的学术旅程中，一直在求助东方思想以理解我自己的文化在众多社会领域陷入的困



境。

下面，简要地谈谈所收的论文本身。笔者的职业，主要是培养中小学和大学教师。为师的一大职责是帮助学生理解其周围的世界，既要利用当时流行的历史、哲学、科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又要将它们置于现时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因此，这些论文反映的是一场独特的文化之旅，费点笔墨谈谈这些论文，也许有助于我们之间就教育的意义问题进行对话。

拙著的第一部分“全球化与教育”，体现的是我近期的研究，即全球化的举措对于教育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的影响。近十年来，加拿大的各大公司企业试图彻底改写教育议程，让教育服务于技术发展和市场起伏波动的需要。于是，从二战以来确立的教育以培养合格公民为本的一系列原则遭到攻击，因为新式资本主义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意欲从根本上摆脱对于民族和国家所负的责任。一旦将责任定义为“全球性”，就完全不必对“地方”——当地的社区和社会负任何责任。相反，责任对象变成无影无形、可能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股东。

全球化现象的第二大特征，是让商业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要求教育本身必须对商业的成败负责。“教这门课能让我们赢利吗？”“作为大学的顾客，学生们对某某教师满意吗？”“将来，上学乃是个人的商业投资，而非由政府资助的人权，因此，学生必须按其长远投资收益缴付相应的学费。”在北美，这类问题和说法，天天挂在大学行政领导和地方中小学主管的嘴上。如今，教育活动内在的或道义价值，已无人问津了。

拙著的第二部分“阐释学与后现代教育学”，代表的是全

球化盛行之前我的一些研究方向,不过,从深层上讲这两部分是密切相关的。在西方,激进的自由市场理论今天之所以上升到不可一世的地位,是因为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众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促成的。例如,60 年代欧美爆发了学生暴动,抗议学校所开课程根本不涉及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如表现在越南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误,体现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欧洲中心论臆断的妄自尊大,尤其是技术、理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非人的生活状态等。这类抗议导致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的革命**。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再也不去通过装出一副“科学的”姿态、主要教学生如何通过数据统计来研究人文现象等来求证自身的合法性了。相反,大家纷纷转向后来以“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著称的研究,目光集中于人的主体性以及各人对这个世界的切身体验,而不去研究行为的普遍规律。

这样一来,阐释学(解释的艺术)、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和现象学(体验的研究)等语言,开始在社会科学和包括教育在内的人文学科领域盛行起来。有几篇论文,代表了那个时期从事的研究。

到 80 年代中后期,北美各大学掀起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名目繁多的运动,再一次对欧洲关于真理、实在和意义的本质的哲学论断展开激烈的批判。本书第二部分中有几篇论文,探讨的便是这个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反映在教学研究方面的特征。

本书第二部分讨论的两大运动(人文科学和后现代主义)在

掀起激烈的政治抵制运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保守力量认为大中小学灌输的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因而有必要对各校进行更有效的监控，以利于那个强大的资本阶级。这场斗争时至今日还在进行。

拙著的第三部分“东西方教育对话”，代表本人在表明中西双方怎样就教育理论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方面所尽的绵薄之力。在“教学中的身份、自我与他人：东西比较探索”一文中，笔者力图从西方和亚洲智慧的角度，作些比较研究，探讨怎样搞好教学。

本书收入的最后一篇短文，探讨的是个人和集体在当今之世该怎样应对东西方共同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文章邀请大家就离家、通过某种方式离开自身的传统、进而带着更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归家的重要意义、作番默念。

最后，谨向郭洋生先生表示特别的谢忱，感谢他为翻译本书付出的辛劳。郭先生于1998年来阿尔伯塔大学攻读博士之前，在翻译方面已有了深厚的造诣。他将严谨的译风，娴熟的翻译技巧，以及对体现在语言中的深刻而微妙的文化差异的敏感，带到我们这里来了，使我们获益匪浅，因为这一切正是人们想跨越遥远的时空阻隔进行交流所需要的。

祝各位读者安好！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与社会国际论坛

1999年11月1日